

公共知識份子

——面對甚麼樣的公眾？如何面對？

● 應 星

2004年11、12月，《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了批判「公共知識份子」的文章。在這場政治色彩濃烈的爭辯中，對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勾勒有着鮮明的褒貶成分。如果按照雅各比的定義，公共知識份子是就公共問題面對公眾發言的人，那麼，辨識公共知識份子，不僅需要與專業學者有所區分，還要與貌似公共知識份子、實則可稱之為媒體知識份子的人區分開來。

《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2004年9月)在「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50人」專題中，高度讚揚公共知識份子在社會轉型中的社會責任，使公共知識份子一時間成為網絡上的熱門話題。但此後不久，此話題即遭到主流媒體嚴厲批評。2004年11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透過表像看實質——析「公共知識份子」論〉的文章，作者吉方平指責公共知識份子這個概念的實質是要「離間知識份子與黨的關係、和人民大眾的關係」。十天後，《人民日報》轉載了此文。2004年12月14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警惕「公共知識份子」思潮〉的文章。

在這場政治色彩濃烈的爭辯中，雙方對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勾勒有着鮮明的褒貶成分。這裏暫且拋開雙方對公共知識份子對立的道德和政治評判不論，雙方至少都認為公共知識份子是就公共問題面對公眾發言的知識者。這個看法與最初提出這個概念的美國學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倒是一致的，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後的知識份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書中談到，過去的知識份子通常都具有公共性，都是為有教養的普通讀者寫作的。但在美國，1920年代出生的一

代人卻成了最後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隨着大學教育體制的擴張，公共知識份子已經被僅僅為專業讀者寫作的大學教授和專家學者所替代了。那些知識份子的專業生涯成功之時，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漸貧乏衰落之日^①。不過，另一位美國學者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討論了公共知識份子的衰落問題。在他看來，當代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並未消失，相反地，熱衷於在自己專業範圍以外就公眾關心的重大社會問題在公共媒體上發言的公共知識份子愈來愈多，然而，問題卻在於公共性愈多，智識卻愈少^②。

如果按照雅各比的定義，公共知識份子是就公共問題面對公眾發言的人，那麼，無論是在當代美國社會，還是在當代中國社會，我們都不得不面對波斯納所提出的悖論：「公共性愈多，智識性愈少」的人可以稱得上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嗎？那些三天兩頭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卻產生不出任何真正的學術著作的「著名學者」也可以算是公共知識份子嗎？

看來，誰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問題並非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要辨識和討論公共知識份子，不僅需要與專業

學者有所區分，還要與貌似公共知識份子、實則可稱之為媒體知識份子的人區分開來。本文即是要在與這兩種理想類型的對比中來澄清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並揭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當前所面臨的若干困境。

大學、專業化與 公共知識份子

在許多論者看來，知識份子這一群體之所以被分化為公共知識份子與專業知識份子，並最終導致公共知識份子被蠶食殆盡，這要歸罪於大學體制。「做一個知識份子就得成為一個教授。這一代人湧入大學，如果他們想做一個知識份子，他們就得一直呆在那兒。他們走不出學校，不是他們缺乏才能、勇氣或政治態度；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公共話語；結果，他們的寫作就缺少對公眾的影響。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於更龐大的公眾來說，他們還是看不見的。消逝的知識份子就消逝在大學裏。」^③對於雅各比最後得出的那個斬釘截鐵的斷言，我們仍存有一個疑惑：知識份子轉向大學，是否就意味着公共性的消失？對公眾發言，這是否就意味着發言者必須站在大學院牆外，或者必須是對大學院牆外的公眾發言？

在我看來，那些跟在雅各比身後高喊「(公共)知識份子消逝在大學裏」的人，他們犯了一個共同錯誤，那就是把大學的傳統簡單地等同於專業教育的傳統。實際上，現代學科的細密分化、專業教育的蓬勃發展，是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後五十年才日漸突出的現象。而自大學在中世紀晚期誕生以來，則存在着一個源遠流長的自由教育傳統。所謂自由教育，按照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

說法，是要培養富於教養的才智，靈敏的鑑賞力，率直、公正、冷靜的頭腦，高貴、謙恭的處世風度，簡言之，是要培養一種以自由、公平、冷靜、克制和智慧為特徵、終身受用的思維習慣。紐曼在其名著《大學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特意將自由教育與專業教育作了對比。他認為專業教育雖可訓練各種專門的才智，但這些訓練並不能使人擺脫奴役，而大學的首要目標應該是通過自由教育來塑造有教養的公民^④。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紐曼所代表的自由教育觀中，大學真正的重心所繫，既不是大學教授自身對高深學問的研究，也不是對學生所進行的專業技能傳授，而是對有教養的普通公民的塑造，是對普遍知識的傳授。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左拉(Emile Zola)所代表的(公共)知識份子傳統與紐曼所代表的(大學)自由教育傳統真的是互不相關甚或彼此對立的嗎？

那麼，讓我們先回到「知識份子」這個概念的歷史脈絡中來考慮這個問題吧。「知識份子」這一概念誕生於1897年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左拉發出的「我控訴」的呼籲聲，它展現的是知識者在文化職業之外的一種批判者的姿態。知識份子都是接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並以其知識技能為生的人。然而，並非所有受過較高教育的人都可以被稱作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還必須具備對社會一貫而熱誠的關懷與批判精神。「成為一個知識份子」意味着的是，超越對自身所屬的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懷，參與到對真理、判斷和時代的趣味等這樣一些普遍性問題的探討中來^⑤。自由教育的傳統同樣是要超越專業技能的教育，激發人們對整全的追尋。從這個角度來說，知識份子的傳統與自由教育的傳統在其基本精神上是一

那些高喊「(公共)知識份子消逝在大學裏」的人，他們犯了一個共同錯誤，那就是把大學的傳統簡單地等同於專業教育的傳統。實際上，現代學科的細密分化、專業教育的蓬勃發展，是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二十世紀後五十年才日漸突出的現象。而自大學在中世紀晚期誕生以來，則存在着一個源遠流長的自由教育傳統。

並非所有受過較高教育的人都可以被稱作是知識份子。「成為一個知識份子」意味着的是，超越對自身所屬的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懷，參與到對真理、判斷和時代的趣味等這樣一些普遍性問題的探討中來。自由教育的傳統同樣是要超越專業技能的教育，激發人們對整全的追尋。因此，知識份子的傳統與自由教育的傳統在其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致的。儘管前者表現為戰鬥的激情、道德的勇氣，後者表現為審慎的思考、理智的心性，但是，如果激情要不流於盲目衝動，理智要不流於麻木不仁，那麼，激昂的鬥士與睿智的紳士本就是一體的兩面。

當然，由於1950年代以前大學教育普及程度尚不高，由於貧富懸殊等種種因素，那時的知識份子中有不少人沒有機會上大學，有些甚至連中學都未唸完。但是，他們之所以最後成為知識份子，無不是以讀書為業、以理念為生的，他們所獲得的思想營養在相當程度上仍得益於大學自由教育的傳統。更重要的是，他們雖然立姿向整個社會發言，但真正積極響應他們所發出的戰鬥號角的，並不可能是所有公眾，而是以或多或少受過自由教育薰陶的人為主體的。就拿德雷弗斯事件而言，左拉本人雖然不是從大學中出來的，但在贊成重審此案的聲明書中簽名的，多半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或大學教授，而在社會上積極響應左拉的所謂「德雷弗斯派」，其「主力一般是在中學和大學圈子——雖然不是在那些法律和醫學的專科院校——尤其是在那些地方上的共和主義者中，在那些出身中下層甚至貧民階層家庭的知識份子中，在那些由於他們所受的訓練使他們對普遍觀念比對現實要求更為敏感的人們中」^⑥。可以說，無論是拍案而起的知識份子，還是應者雲集的知識份子閱聽人，在相當程度上都是在大學自由教育的傳統中塑造出來的。

如果說在大學教育普及前，自由教育傳統為(公共)知識份子傳統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的話，那麼，在大學教育逐步普及的今天，自由教育與知識份子的言說就有了更直接、更緊密的關係。因為對於大學普及率超過

60%的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受過大學教育者已經構成了公眾的大多數。因此，教授在大學裏所進行的旨在塑造有德性的公民的自由教育，這本身就是為最重大的問題對最重要的公眾發言。實際上，對於許多已經充分實現民主制、建立多元制衡的國家來說，(公共)知識份子的批判鋒芒所指向的，已經不再是鉗制自由的專制行徑，而是引人墮入卑俗虛無的大眾文化。正如政治哲學家斯特勞斯(Leo Strauss)所說的：「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毒劑，是大眾文化腐蝕性作用的解毒劑，是大眾文化不生產別的，只生產『沒有靈魂或眼力的專家和沒有心肝的縱欲者』的固有傾向的解毒劑。」^⑦斯特勞斯終其一生，在大學校園默默耕耘，帶着一批批弟子埋首經典大書，生前很少談及美國，也從不參與美國的任何當代政治辯論或政治活動，更從未寫過任何關於美國政治的文章，然而，斯特勞斯學派後來卻對美國政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所謂的「政治哲學」基本落實為「教育」，通過在大學裏從事自由教育影響了未來的公民和立法者。對這位後來被美國主流報刊尊為「共和黨革命的教父」的大學教授，難道我們能夠將他從公共知識份子的行列剔出去嗎？

然而，我們的確要看到當今社會伴隨着大學的民主化、學科的分化、專業教育的發達而帶來的嚴重問題，也即自由教育的邊緣化和衰落。布魯姆(Allan David Bloom)這樣描繪了自由教育的危機^⑧：

大學本是精神發展的富饒之地。而現在對大學所謂自由技藝的片斷一瞥，就會看到大學裏所有的是一堆互不相關的系，各自教授的是專業學科，這些學科有着幾乎不被討論的預先假

定，這些假定常常無法與其他學科的預先假定相容。這些學科是在過去一千多年的不同時間裏陸續集合在大學中的。它們之間殊少一致，既不能從任何單獨的學科也不能從所有的學科中明顯地看到某種人生觀和世界觀。最重要的問題始終被遺忘，甚至對大學整全性或生活整全性的理性討論的手段似乎都已經消失了。……大學已經證明它自己無力教授學生善好的生活是甚麼，因為那是我們大學裏任何一部分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去討論的一個主題；它不屬於任何一個系或任何一個將系組合起來的群體。我們教授的教育是專業化、技術化的，老式的人文教育或多或少地摻和在其中，但不會真正被重視或滲透在這種專業學科中。

所以，我們與其驚呼知識份子消逝在大學中，不如痛惜知識份子消逝在大學的過度專業化中。儘管專業教育的大力鼓吹者喜歡援引韋伯 (Max Weber) 的名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韋伯在這篇「以學術為業」的著名演講中同時告誡我們，專業教育並不能使人們足以找到把握他生命之弦的守護神；我們更不要忘了，韋伯本人的學術著述和教授生涯都不是由某一個學科所嚴格限定的。對於那些在狹隘的學科「自留地」裏自得其樂、在生僻的專業刊物上孤芳自賞的專業學者來說，我們的確可以說他們的身上已經再沒有了公共知識份子的精神。

對於中國當代社會來說，公共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困境更加複雜。這種困境就大學體制內部來說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專業化教育在實質上的發展不足，導致真正有創新意義的「知識」的難產。公共知識份子的發言或教學本應該是以其自身紮實的專業素質為基礎的，但許多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其實是行走在洛奇 (David Lodge) 所謂「小世界」^⑨中的學界混混。對這些人的形象，我們在下面談到媒體知識份子時會有進一步的勾勒。

第二個方面是專業化教育在形式上的過份追隨美國主流的教育體制，導致自由教育難以在中國大學裏扎根。許多專業學者雖然在其專業領域認真治學，但對學科劃分、術業專攻的過份強調，導致原來相對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切割為一個個細微的蜂窩狀的專業領地，不僅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論題和共同的知識旨趣，而且他們都因畏懼「大而無當」的指責而放棄了對最大的問題的追尋。

第三個方面的問題，也是在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即中國許多著名大學紛紛打出向「研究型大學」進軍的旗幟，導致大學本來最重要的教學工作遭到嚴重忽視。在所謂「與國際接軌」的旗幟下，國內著名大學的發展規劃都一古腦兒地把重點放在了所謂的科研成果上，學者個人晉升職稱幾乎全靠科研成果和所謂科研課題。在這樣的風氣之下，教學幾乎變成了純憑教師個人良心的工作，無論是認真的還是不認真的，教學效果好的還是效果不好的，都缺乏有效的考評和激勵手段。然而，如果我們仔細地去考察西方國家，就會發現，絕大部分教師對教學那種高度重視、高度負責的態度已經成為西方著名大學最重要的共同傳統。當大學教授對教學敷衍了事的時候，當學者把眼光都盯在所謂的專業核心刊物的時候，當「靠學術為生」

對於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困境，就大學體制內部來說，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專業化教育發展不足，導致真正有創新意義的「知識」的難產。第二在形式上過份追隨美國主流的教育體制。第三也是在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即中國許多著名大學紛紛打出向「研究型大學」進軍的旗幟，導致最重要的教學工作遭到嚴重忽視。

的人一門心思參加各種級別的課題分贓會的時候，他們與公共生活的通道就被徹底地切斷了。

公共知識份子，還是 媒體知識份子？

我們在上面談到了公共知識份子並非只對學院外的公眾發言。像斯勞斯那樣儘管根本不在公共媒體拋頭露面、潛心於大學自由教育的教授仍可以稱得上公共知識份子。不過，這也並不是說，只有那種類型才是公共知識份子。我們對多數公共知識份子的判斷，還是需要從他們在公共媒體上的發言來入手。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對公眾發言，而在於怎樣對公眾發言。事實上，我們在公共媒體更經常見到的形象是所謂的「媒體知識份子」。所謂媒體知識份子，並不特指那些身居學院外的體制外知識份子，而是指無論是否在學院有一席之地、但基本上把精力放在對自己的媒體形象的經營上的知識從業者。那麼，同樣是在公共媒體上發言，究竟如何分辨真正嚴肅的公共知識份子與誇誇其談的媒體知識份子呢？

首先，他們發言的立場不同。媒體知識份子的發言表面上採取的是獨立的學者立場、批判的姿態，實際上卻是意在取悅官方或迎合市場，或者說是對宣傳要點或市場口味的知識包裝。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思想的獨立受到來自傳統的威權力量和現代的資本力量的雙重鉗制，這裏尤其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打造出來的一個「偽民間」。這種「偽民間」看似繼承了公共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實際上卻是屈從於市場邏輯，也從一個側面回應着時事宣傳導向。比如若干年前在市場走紅的《中

國可以說「不」》一書就是典型例證。在中國當前這樣一個特殊的轉型時期，極端的民族主義聲音既不會觸及政府的痛處，更會煽動起未經反思的民間情緒，因此，理性思考滑落為對市場追新逐奇的偏好的滿足，知識份子的批判蛻變為煽情的表演、博取喝彩和「票房」的誇張修辭。正如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分析的^①：

他們像左拉那樣拋出《我控訴》，卻沒有寫過《小酒店》或《萌芽》，或者像薩特那樣發表聲明、發起遊行，都沒有寫過《存在與虛無》或者《辯證理性批判》。他們要求電視為他們揚名，而在過去，只有終身的、而且往往總是默默無聞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們獲得聲譽。這些人只保留了知識份子作用的外部表像，看得見的表像，宣言啦、遊行啦、公開表態啦。其實這倒也無所謂，關鍵是他們不能拋棄舊式知識份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點，即批判精神。這種精神的基礎在於對世俗的要求與誘惑表現出獨立性，在於尊重文藝本身的價值。而這些人既無批判意識，也無專業才能和道德信念，卻在現時的一切問題上表態，因此幾乎總是與現存秩序合拍。

對於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而言，他們既不是簡單地為政策做註釋，也不是一味地迎合市場的需求，而是真正從自己的獨立思考出發，敏銳地抓住重大的社會問題來推動社會進步。比如，2003年一些法學家抓住孫志剛案件一批批地上書，最後促成了收容遣送辦法的被廢止，這就是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力作。

其次，他們發言的基礎不同。媒體知識份子雖然表面有知識份子的身份，實際上卻並不生產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因此，他們的發言不是越

媒體知識份子意在取悅官方或迎合市場。若干年前走紅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就是典型例證。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則是從自己的獨立思考出發，敏銳地抓住重大的社會問題來推動社會進步。比如，2003年一些法學家抓住孫志剛案件一批批地上書，最後促成了收容遣送辦法的被廢止，這就是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力作。

出專業領域，而是根本就沒有任何專業基礎，並因此敢於在一切時政和社會問題上發言。正如王小波所辛辣諷刺的那類人：他們一無所能，卻專會明辨是非^②。公共知識份子的發言則是以自己紮實的專業研究和深厚的思想底蘊為基礎的。他們在公共媒體上表現出來的是「言於當言之時，止於當止之時」的審慎理性。他們可以介入重大的社會問題和公共生活，但其前提是必須能夠捍衛知識的自主性。「一方面，尤其要通過鬥爭確立知識份子的自主性，保證文化生產者有一個保持自主性（實現體現在知識活動成果的發表和評價形式中）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強化每一領域裏最自主的生產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創造適宜的制度，讓最自主的文化生產者不受象牙塔的誘惑，以使他們能夠使用特定權威干預政治，為保障他們自己控制文化生產方式和知識合法性的最低目標而奮鬥。」^③我們可以看到，雅各比和斯特勞斯派的弟子布魯姆對知識份子有兩種不同的界定：前者將知識份子視為介入公共生活、承擔社會義務的激進知識份子，後者則將知識份子理解為自律的、沉思的、獨立地追求知識智慧的學院知識份子^④。不過，這與其說是對知識份子的兩種界定，不如說是知識份子的兩個面向。布爾迪厄所倡導的所謂「普遍性的法團主義」，就表明了這兩個面向並非完全相對對立的。

再次，他們發言選擇的媒體有所不同。就受眾面來說，電視具有遠勝於其他媒體的公共性，然而，上電視所付出的自主性代價也遠高於其他媒體，因為在電視上，「主題是強加的，交流的環境是強加的，特別是講話的時間也是有限制的，種種限制的條件致使真正意義上的表達幾乎不可能有」^⑤。媒體知識份子是因為在著名的

媒體露面而出名，因此，他們必然首選出名最快捷、符號資本最雄厚的公共媒體——電視。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首先是因為其學術名著而名，他們珍惜自己的學術名譽，更珍惜自己的思想自主性，因此，他們大多不願意接受被電視編導七零八落地閹割的命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們發言的旨趣不同。媒體知識份子熱衷於為社會問題提供一個簡明的答案，對未來作出一個清晰的預測，告訴人們應該去做甚麼，而公共知識份子則重在引導人們思考各種行動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力圖使理性擺脫冷漠、使熱情避免亢奮。當然，在這裏，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有一個演化的過程。在知識份子誕生之初，的確是以立法者自居，自視為真理的化身、社會的良心、正義的代言人，但在今天，公共知識份子已經變成了鮑曼 (Zygmunt Bauman) 所說的闡釋者，不是去替公眾和社會選擇最佳秩序，而是為了促進自主性的共同參與者之間的交往，促進人們將對自由的追求奠基在自己的倫理實踐中。對此，福柯有更深入的洞悉：「知識份子的工作不是要改變他人的政治意願，而是要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他的知識份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他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⑥也許是因為福柯的審慎，在波斯納對公共知識份子的量化研究中，福柯雖然高踞學術引證最高的公共知識份子之榜首，但卻遠在媒體提及最多的一百位公共知識份子之外^⑦。然而，福柯的影響卻不止於學術界。在今天已成洶湧之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女權運動等種

公共知識份子在媒體上表現出來的是「言於當言之時，止於當止之時」的審慎理性，其前提是必須能夠捍衛知識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要創造適宜的制度，讓最自主的文化生產者不受象牙塔的誘惑，以使他們能夠使用特定權威干預政治，為保障他們自己控制文化生產方式和知識合法性的最低目標而奮鬥。

一般人認為公共知識份子就是尋求在公共媒體上就重大社會政治問題對公眾發言的知識人。這樣一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定義模糊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德性和力量。實際上，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對大學之外的公眾發言，而在於究竟如何對大學生這個最重要的公眾群體發言。那些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的公共媒體都經常可見到的「學術明星」、「著名專家」，反倒可能離公共知識份子相差遠矣。

種激進的社會實踐中，都可以見到福柯的影響。從這點上說，不僅學術聲譽與媒體名聲不成比例，而且社會影響力也與媒體知名度不相匹配。

本文從兩個方面對公共知識份子所作的討論，意在澄清對這個概念的認識，從而理解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價值。一般人認為公共知識份子就是尋求在公共媒體上就重大社會政治問題對公眾發言的知識人。這樣一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定義模糊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德性和力量，使那些誇誇其談、滿嘴胡扯的媒體知識份子也混迹其中。實際上，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對大學之外的公眾發言，而在於究竟如何對大學生這個最重要的公眾群體發言；問題的關鍵也不在於是否在公共媒體上發言，而在於究竟如何在公共媒體上發言。就此而言，像左拉、薩特(Jean-Paul Sartre)、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這樣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發言的學者文人固然是公共知識份子，但像福柯這樣堅守在邊緣的戰鬥、以所謂反普遍性的「特殊性」知識份子自命的人也毫無疑問是公共知識份子。甚至像斯特勞斯那樣終其一生不在公共媒體上發言、默默耕耘在以聖賢書為焦點的自由教育領域並最終以其哲學生活影響了政治生活的教授，也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公共知識份子。相反，那些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的公共媒體都經常可見到的「學術明星」、「著名專家」，反倒可能離公共知識份子相差遠矣。

註釋

①③ 雅各比(Russell Jacoby)著，洪潔譯：《最後的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4-5；13。

②⑦ 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徐昕譯：《公共知識份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頁208；265-68。

④ 紐曼(John Henry Newman)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頁22、40。

⑤ 鮑曼(Zygmunt Bauman)著，洪濤譯：《立法者與闡釋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⑥ 柯塞(Lewis A. Coser)著，郭方等譯：《理念的人》(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頁243。

⑦ 斯特勞斯(Leo Strauss)著，應星譯：〈甚麼是自由教育〉，載《斯特勞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待出版)。

⑧ 布魯姆(Allan David Bloom)著，應星譯：〈大學的民主化〉，載《巨人與侏儒：布魯姆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頁338。

⑨ 韋伯(Max Weber)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3。

⑩ 洛奇(David Lodge)著，趙光育譯：《小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⑪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哈克(Hans Haacke)著，桂裕芳譯：《自由交流》(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51。

⑫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園》(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頁1。

⑬ 布爾迪厄著，趙曉力譯：〈倡導普遍性的法團主義：現代世界中的知識份子角色〉，《學術思想評論》，第5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⑭ 參見布魯姆著，繆青等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⑮ 布爾迪厄著，許鈞譯：《關於電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11。

⑯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王倪譯：〈真理與權力〉，載《福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即將出版)。

應星 社會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